



我做编辑大概有四五年时间,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便迎来了千期纪念,那是1983年。很荣幸,我参加了组稿工作,还将一些细节记在了编辑日志中。这段历史虽很珍贵,但因为参与者不多,所以并未留下更多的文字记载。2002年7月12日,孙犁先生病逝后的第二天,文艺部同仁编发了一期怀念特刊,我写了一篇短文《从1000期到2000期》,对所经历的千期纪念做了回忆。

“文艺周刊”千期纪念,是一件特别值得关注的大事。这块版面,从编者到作者都经历了历史的考验。它所刊发的文艺作品,不仅见证了大批文学人才的成长,而且为一代代读者留下了极为难忘的纪念。在千期纪念即将到来之际,主编李牧歌经过反复酝酿,制定出一套组稿方案,除去电话和写信联系的作者,重点稿件还准备到北京去约。大约是在1983年3月中下旬,我跟随李牧歌出差北京,先找到诗人张志民,又去找了刘绍棠、从维熙等人。回津后,我又来到孙犁先生家,向他汇报千期纪念的组稿情况。

按照设想,“文艺周刊”千期纪念拟出两期专版,主要邀约与“文艺周刊”有过交往的作者与作家,请他们撰写文章和诗歌。孙犁听取了专版方案后表示认可。李牧歌说,我们还准备约华君武画一幅漫画,想请您替我们写封约稿信。孙犁点头同意,说现在就可以写。他取出笔和信笺,当即便给华君武写了一封约稿信,然后叮嘱说,这封信一定要派专人送到。

李牧歌看过信后又递给我。我记得信的大意是:对华君武的漫画非常喜爱,倘能在我们的刊物千期之时赐画,则可“光耀版面”。信虽写得简短,但“光耀版面”几个字令人印象深刻。这封约稿信,日后成为我给作家们写约稿信的范本。

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李牧歌对孙犁说,“文艺周刊”能出到1000期很不容易,风风雨雨的,这次千期纪念的专版上,希望孙犁同志也能够写一篇文章。孙犁听后,略微思考了一下,便欣然应允。李牧歌很高兴,她站起身来说,孙犁同志,谢谢您。希望您多保重身体。

这不是一般的约稿,无论是对孙犁——他对“文艺周刊”所怀有的感情、执念,还是对此时身负重任的李牧歌,在“文艺周刊”将达千期之时,她期望得到孙犁的信任和支持。在这样一个备受关注的节点,李牧歌的恳请与孙犁的答复,是对“文艺周刊”这块文艺园地的共有之情,是当代编辑之间的一种无间与默契。

“文艺周刊”从1949年3月24日创刊日开始标注期号,每周一期,但在“文革”的十余年间,改刊名为“尽朝晖”。1979年1月4日,“文艺周刊”复刊,按上之前的序号,又经四载途程而至千期。谁能想到,这个千期行旅竟然长达三十四年。显然,这是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,纪念专版的组稿工作必须有序落实,不容有失。

1983年4月28日清晨,天降大雨。我在8点之前赶到报社,李牧歌已在办公室。纪念专版的文字稿件基本到齐,只差漫画这个“东风”。李牧歌让我给华君武先生打个长途电话,再询问一下画稿情况。因之前我已和华君武通过电话,说了漫画的事,所以华君武在电话中说:“你们约的画我已经画好了,今天便可以寄出。孙犁同志的信不要再派人专送,邮寄就可以了。”在电话中,我代表“文艺周刊”和孙犁先生,向老画家表达了谢意。

1983年5月5日和5月12日,“文艺周刊”连续推出两期纪念专版。第一块专版的头条位置,是诗人张志民的诗歌《“一千”颂》,右上便是华君武的漫画《硕果一千》,还有韩映山、刘绍棠、从维熙等人的文章。孙犁应李牧歌所写的《我和(文艺周刊)》,也登载在第一块纪念专版中。第二块专版,则刊发了方纪、李麦、阿凤等的文章。“文艺周刊”以专版形式祝贺出刊1000期,是一种新颖的尝试,也是办刊之旅中的一次小结。专版上的文章,倾注着对“文艺周刊”的真心爱戴,感恩文学为写作者带来的快乐,并引领他们走向多彩的人生。正因为读者与作者的支持,“文艺周刊”才有了这段非凡的旅程。

孙犁的《我和(文艺周刊)》发表后,影响很大。孙犁对有些人说他培养了多少青年作家,认为是夸张的说法,只承认自己为“文艺周刊”看过一段时间的稿子,但他对这个版面是有感情的,也花费过一些时间,付出过一些心力。这是孙犁一种谦虚的说法。“文艺周刊”创刊时间不长,郭小川、方纪两位创办者便相继调离报社,孙犁却留下来继续耕耘,以刊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,培养文学新人作为办刊方针,在版面上不断推出新作者、新作品,在国内文坛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。

那一时期,孙犁先生写了《谈工厂文艺》《略谈下厂》《论切实》等文章,参加工人作者讲习班,具体辅导业余写作。他以编辑的责任心和作家的专业性,为作者讲解如何创作一篇好的小说,其细致、透彻、精准,真是竭尽心血、不遗余力,还从未见过哪位编辑或作家,为扶持业余作者下过如此的真功夫。同时,“文艺周刊”还关注到当时作为学生的刘绍棠、从维熙、韩映山、房树民等人的创作,为他们提供版面,连续刊载他们的作品。孙犁对“文艺周刊”的贡献是数十年全情投入,如果没有当年的亲身

实践,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对“文艺周刊”的那五点办刊希望,孙犁是中国报刊史上当之无愧的编辑典范,建树卓越。

1976年之后,孙犁虽不再坐班,但他仍是报社文艺副刊的一员,是编辑们的主心骨,他对“文艺周刊”倾注的感情超过了一般人。1979年,“文艺周刊”复刊时,编辑人员严重匮乏,他与时任总编辑石坚同志商议,调回了创刊时期的老编辑邹明、李牧歌夫妇,一位主持《文艺》(双月刊),一位主编“文艺周刊”,以期迅速恢复并建立起一支由新老作家组成的作者队伍,重现“文艺周刊”昔日风采,继续成为党报文艺副刊园地中的佼佼者。

“文艺周刊”千期纪念受到广泛好评,证明当时报社的人事安排极为正确。“文艺周刊”从创刊至千期可为一个时段,展现了这块园地的丰厚底蕴,奠定了不断发展并持续前行的坚实基础,所有曾任职的编辑功不可没。从千期起步,2002年8月8日,又是近二十年过去,“文艺周刊”出刊达到了2000期,这串极不平凡的数字,记载下又一段风雨兼程的办刊史。翻检那

累累硕果

——“文艺周刊”从1000期到3000期

宋曙光



些已发黄的报纸,我们记起一个个熟悉的名字:刘绍棠、韩映山、阿凤、万国儒、董迺相、崔椿藩;丁玲、舒群、郭小川、方纪、田间、张志民、曼晴……这些与“文艺周刊”有着至亲关系的作家虽已离开了我们,但是他们的作品,却留在了“文艺周刊”的版面上,在文艺的百花园中,他们将永远活在读者心中,我们也会永远记住他们。

遗憾的是,在即将出刊2000期的前夕,久卧病榻的孙犁先生因病去世,未能等到纪念日来临的这一天。他再也未能听取我们关于“文艺周刊”2000期纪念方案的汇报了,再也见不到他参与创办的“文艺周刊”,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风雨之后,崭新的辉煌。

“文艺周刊”2000期纪念,范围有所扩大,策划了相关系列活动。在版面上,仍延续了千期纪念时的方式,编辑了一期有两块版面规模的通版,文艺部编辑合力约稿,作者层面更为广泛,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河北、山东、云南,作家、诗人、学者,每一篇文章都饱含情义,表达不尽对“文艺周刊”的感恩之情。

这是一期可以载入新闻史的副刊版面,与千期纪念时的铅字印刷不同,数字化的排版技术,使得这期版面更加清秀、美观,图文并茂。多达十五篇的稿件、两幅贺画,倾注的都是炽热真情。铁凝写了《我的感谢》,邵燕祥写了《祝贺与忆旧》,周良沛写了《“文艺周刊”与孙犁风格》。蒋子龙在文章中,说:报纸上的一块文艺阵地竟坚持了半个多世纪,这很能创造了“中国之最”!单是这种韧劲,这份耐性,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,就是功德,就值得称颂。这块园地圆了许多业余作者的文学之梦,也留有前人风范的沉淀,2000期,给历史以艺术的折射,给文坛以历史的投光。冯骥才也在文章中写道:我在“文革”后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篇表述自己文学主张的长文《作家的社会职责》,就是发表在《天津日报》的“文艺周刊”上。二十年来,我把自己各类文章包括小说、散文、文化随笔、脚本和艺术评论,不断地送到“文艺周刊”。我喜欢这块园地。因为,它是我和津门读者见面说话的地方。还有,我更喜欢“文艺周刊”的气质,那就是它文学的纯正性,即对思想深刻、情感真切、审美高品位的追求,“文艺周刊”成为《天津日报》重要的特色之一。刘绍棠的夫人曾彩美,在接受我的电话约稿时说:十九年前,刘绍棠为“文艺周刊”千期纪念,写了一篇文章《忆旧与远望》,对《天津日报》的远见卓识,扶植文学创作的热情与决心,栽培文学新人的智力投资,非常钦佩和感念不忘。孙犁同志把“文艺周刊”比作苗圃,绍棠正是从这苗圃中成长起来的一株树木。希望《天津日报》坚持和发扬这一光荣传统,代代相传。“文艺周刊”不但出版1000期,还要出版2000期、3000期……此外,从维熙、房树民、郭风、赵鑫珊、李贯通、孟伟哉、叶延滨等的文章,都对“文艺周刊”表达了真诚的敬意。尤其让人感动的是,有文章中还提到了李传琅、吴微晒等老编辑的名字,他们令人感佩的编辑风范与奉献,已经印刻在“文艺周刊”的史册上。

“文艺周刊”2000期纪念是一个新的里程碑。历史证明,这块文学副刊已经具有顽强而蓬勃的生命力。从2000期继续前行,至《天津日报》创刊60周年、70周年时,“文艺周刊”都相继组织过纪念专版或是征稿活动,办刊历程中的每一个时间节点,都是对这块园地的一次勉励与助力。

现在,我可以站在阳光之下看花丛中的蝶飞蜂舞与欢快的溪水叙情,愿意去找贴心的朋友聚会坐在书桌前写些心语

过往岁月已熔铸为金遍地秋光,真是价值连城这正是我想要的——幸福祝愿我们的“文艺周刊”春色常在,四季花鲜! 2024年10月26日

2024年是《天津日报》创刊75周年,与之同庚的“文艺周刊”,不仅也已有了75载办刊历史,而且出刊期数达到了3000期,这真是一个骄人的功绩。从1000期、2000期,到今天的3000期,这是一条报纸文艺副刊的成长之路,成熟之路、长兴之路。“文艺周刊”完成了一个创举,奠定了党报文艺副刊的深厚根基,郭小川、方纪、孙犁作为创办者,也是功臣,在新中国的新闻史册上,他们理应占有重要位置,而一代代编辑秉承“文艺周刊”办刊方针,始终延续副刊前辈创下的办刊风格与特色,使这个报纸副刊的文艺百花园,仍然盛开着馨香的花朵,滋养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与作者。

从1979年“文艺周刊”复刊始,我就在这里做编辑,与阿凤、董迺相、滕鸿涛、万国儒、刘绍棠、从维熙、韩映山、房树民……结缘、交友,这些从“文艺周刊”开启文学之旅的作家,自创刊初期便形成了副刊最牢固的作者队伍,我称他们是与“文艺周刊”结有血缘关系的作家,同他们交往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。

1980年秋天,我随邹明前往石家庄参加“荷花淀派”研讨会,结识了其中的一些作家。邹明是代表孙犁赴会的,会前与会后都向孙犁当面做过汇报。那次会议是十年浩劫后的一次重要聚会,与会的作家们十分兴奋,刘绍棠、从维熙、韩映山等人,每天晚上都要到我和邹明的房间里畅谈,他们同邹明就像亲兄弟般亲热,这种情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,原来编辑还可以和作家结下如此情谊。那时,“文艺周刊”已经复刊,与有过联系的北京、河北等地作家,见到了代表孙犁赴会的邹明,似乎有一种见到娘家人的感觉,他们尊孙犁为恩师,喜欢他的人品和作品,愿意聚集在他的麾下,尽管孙犁从未承认过这个流派。

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四十多年,如今在孙犁研究界,有研究者提出“文艺周刊”作家群”的新观点,这与较早前“文艺周刊”现象”的提法有相通之处,颇具新意。记得“文艺周刊”2000期纪念时,从维熙在《祝愿“文艺周刊”永葆青春》一文中写道:“一家市报级别的副刊,在培养文学人才上,能有如此的辉煌业绩,在报界怕也是‘别无分号’了。而今,这批文学新军中有的人虽已离开了人世,但是他们的文学情结与文字情缘中,都滚动着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的精神因子——如果是排阵列队,他们都属于‘文艺周刊’的土兵,都会以曾经在这块沃土上耕耘和在这块园地上开花、结果为荣。”这样的说法是真实的、中肯的,符合历史的。

这是“文艺周刊”第一代作家留下的肺腑感言,正是得益于这样一支作家队伍,“文艺周刊”才有了今天的“3000之旅”。我的编辑生涯就是从这块版面启程,三十多年身处编辑一线,经历了从1000期到2000期的编辑全过程,是“文艺周刊”任期最长的一任责编。我存有的两本作者通讯录上,记录着不断扩大作者信息,他们当中有作家、诗人、翻译家、学者,有军人、工人、农民,有创刊初期的老作家,也包括已有几十年情义的老作者,有本市的,也有全国各地的,山南海北,五湖四海。他们看重的是这块文艺圣地,作为编辑,看重的则是他们对文学的追求与挚诚。

我的朋友圈里,无一例外的都是文学爱好者和写作者,是名副其实的作者圈,即使我退休之后,也与作者朋友们维系着感情,这是他们对“文艺周刊”至深的热爱。两年前,我参与建立了两个读者群,一个是孙犁作品分享群,一个是津味小说作者群。在这两个群里,大家品读孙犁、学习孙犁,每当“文艺周刊”刊登津味作品,我都会转发到群里供作者们分享,鼓励大家热爱读书,坚持写作。群里组织的“我与孙犁”丛书分享会、津味作家研讨会等活动,都取得了很好的反响。这就是“文艺周刊”恒久的影响力,它仍然是读者与作者心目中的那片文学净土。

在“文艺周刊”出刊3000期之际,我回忆起一些编辑往事,它们是平凡工作中结晶的情感,是每一期版面上下付出的心血,是永远不会逝去的一份初心……在历史的长河中,一个人的经历、作用毕竟有限,但同时我们个人的微薄之力,又会助燃这份事业,使之放射出圣洁的光芒。前不久,我写了一首诗《我想要的幸福》,刊发在《当代·诗歌》上,倾吐了我对报纸副刊编辑工作的一番情怀:

自己从阳光中寻觅金粒
从雨露中获取滋养
从风雪中感知坚韧
从开怀的笑声和关爱里
获得满足与富有

为了拥有这份财富
我曾不舍昼夜地躬耕
岂止是挥洒汗水和辛劳
还有昂扬的青春和热血
这种付出不求回报
甚至从没想过要享用它们
没有,它们是不动产
是我整个人生的金矿

但人老了,有了白发
回看身后的来路
我的心忽然间柔软下来
田园里那片葱茏的春花
正朝我微笑,是的
我曾经爱护过开花的种子
一生都在亲近它们

现在,我可以站在阳光之下看花丛中的蝶飞蜂舞与欢快的溪水叙情,愿意去找贴心的朋友聚会坐在书桌前写些心语

“《文艺周刊》应该永远是一处苗圃。”这句话是孙犁1983年4月在“文艺周刊”即将出刊1000期之际说的,当时他应约写了《我和(文艺周刊)》,总结自己与这份副刊的“历史”和“缘分”,提出了办刊希望——着实是语重心长的。他的意思是,应该多发“新作者”的作品,而一旦这个“新作者”成长起来,“可以向全国发表作品了”,就如同苗圃中的树苗一样,可以被移植走了。从这个命题提出的时间看(孙犁70岁),孙犁把“文艺周刊”比喻为苗圃,并非忽然想到,实际有一种“定位”的意味,因此这个关键词相当重要,甚至将其视为孙犁办刊的核心宗旨也是可以的。

这块苗圃,是孙犁等老一辈编辑家开荒、建设起来的,可谓“白手起家”。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,孙犁16日进城,17日《天津日报》创刊,当时孙犁任副刊科副科长。3月24日,“文艺周刊”正式出刊,副刊有了自己的“名号”。“文艺周刊”的特征在创刊号就有明显表现:军管会分管文艺工作的陈荒煤在《天津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任务》中,高屋建瓴,号召关注“新文艺进城后的进一步发展与创造的问题”;诗人鲁藜在《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女》中,抒发了用“劳动的双手”来“创造新时代”的高亢、灼热的激情;署名何恩荣的散文《我回到自己的工厂》,以一个织布工人的口吻,说“天津解放了!我又回到了工厂,我再也不是‘臭织布的’”,“共产党把你救活了!现在你根深叶绿,开了花”,“翻来覆去睡不着,心里高兴得不行”。当然几篇文章不能完全说明问题,但作为隐喻,还是可以看到“文艺周刊”与时代同频律动的姿态,以及“立足天津、放眼全国”的视野。

上述特征,可能在当时的报纸副刊中不算突出的,因为这是一种“时代潮流”,但让苗圃更具独特气质的,是孙犁的写作实绩。孙犁在“文艺周刊”创刊号上发表了总题为《农村速写》的三篇散文,主要是赞美农村的新景观和新人。其中,《“帅府”巡礼》写了一个有“各节”(干净、利落之意)美誉的农民赵老师,孙犁形容他“爱好干净,简直成了一种癖性”时,打比方说,他“刷洗的小牛好像刚出阁的媳妇”。写这家的儿媳照看孩子时,孙犁的比方是,“孩子在她手里旋转,像一滴晶莹的露珠,旋转在丰润的花朵里”。这就是“孙犁式”美学了,因为孙犁在“适合”潮流的叙述中,总是可以发现一些更为个人化的、出人意料的比喻,如同催化剂,使小说乃至“文艺周刊”的气质瞬间“出戏”,与众不同了。

作为苗圃,“文艺周刊”培养了一大批工人作家,这是天津文学的“独一份”。“文艺周刊”创刊伊始,就把文学与工人联系到了一起——以前这个想法是不可能的,毕竟工人的本职是做工而不是写文章,而且,连操作方式都带有战争年代的印记。老作家冯骥才回忆:“文艺周刊”创刊会上,郭小川“穿着灰布军装,腰挂盒子枪,一副战斗诗人的特色,在发言中提出了不仅在天津,就是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响亮的号召‘把工人业余作者扶持起来’,‘把工人文学创作活跃起来’”。

这样的背景下,“文艺周刊”积极向工人倾斜,1950年8、9月间,多次发布《征求工厂墙报文艺作品》的“稿约”,有意识刊发一线工人的作品。当时天津工人的写作水平以现在的标准看并不高,但因为是历史性的第一次“工人写自己”,可谓轰轰烈烈,恰与当时的时代氛围匹配。1950年3月10日,“文艺周刊”发表了大吕的《于师傅这二年》和董迺相的《我的老婆》,还配上了“编后记”,对作品进行了介绍和点评。接着,在下一期的“文艺往来”中,发表了读者来信,认为“我们的文艺周刊从这一期起,又开辟了一条光辉灿烂的新道路”。显然,这是带有一定“操作”意识的行为,极大程度表明了“文艺周刊”支持工人作家的决心。这批作品受到文化部部长茅盾的关注,在《关于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》(《人民文学》1950年第2卷第1期)中提到《我的老婆》《于师傅这二年》。董迺相来自天津北站,大吕来自中纺二厂,都是一线工作业业余写作的工人。当时“文艺周刊”还成立工人文艺小组,每周日到报社活动,进行研讨与交流,很快涌现出一批工人作家:阿凤、大吕、滕鸿涛、董迺相、史林碧、何苦……并由此形成了传统。当代文学史上天津工人文学能有一席之地,与“文艺周刊”的引领和支持密不可分。

孙犁出生于农村,对城市工人的生活并不熟悉,但他对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。1949年1月17日《天津日报》创刊,第二天,孙犁就发表了《谈工厂文艺》,提出“在天津,文艺工作主要是为工人服务”,工人群众不仅成为文学书写的重点对象,也要成为副刊作者的主力军”。孙犁经常参加工人写作小组的活动,从技术上对这些业余作家“手把手”传授经验,这一时期撰写了大量指导性的文章,如《作品的生活性和真实性》《论切实》《怎样把我们的作品提高一步》《论情节》《论风格》,都发表在“文艺周刊”上,这种具体的、带有孙犁印记的指导,对工人作家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。从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,天津工人作家中的佼佼者万国儒,同样是在“文艺周刊”起步,孙犁给予了一以贯之的支持。他在万国儒《欢乐的离别》序言中说,“万国儒的小说,较之其他一些工人作者的作品,是多情趣的,涉及的生活,也比较广泛”。

“荷花淀派”是“文艺周刊”这方苗圃中培育、成长起来的,是当代文学史上的“奇迹”之一,因为依靠一个副刊的力量,形成有一定影响的流派,在当代的语境中是极其罕见也可以说绝无仅有的。其中,孙犁作品的风格和人格魅力是主要因素。孙犁的风格在革命文学中,是非常个人化的,这并非

不是说孙犁不“贴近”革命叙事,而是说他找到了“触摸”革命的另一角度,也就是通常被指认的“诗意”——这在革命叙述中,是非常稀缺的——尽管孙犁本人并不是刻意为之,甚至还抵评论者用“诗意”来概括自己。但毫无疑问,这种也许在今天看来也并非特别纯粹,却是特别文学的内核,在当时是很吸引人的。

孙犁既有自己独特风格,又在“文艺周刊”工作,就有意无意地影响、支持了一些青年作家从这块苗圃起步,走上了文坛。1951年,15岁的刘绍棠在“文艺周刊”发表了《完秋》《暑假》等作品。刘绍棠后来回忆说,“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生活强烈的美感,打开了我的美学眼界,提高了我的审美观,觉得文学里的美很重要”。不只刘绍棠,一批年轻作家如从维熙、韩映山、房树民等,在文学的道路上,都受到过“文艺周刊”和孙犁的帮助,他们发表在“文艺周刊”上的作品,在1953年结集为《运河滩上》,组画“出道”,非常壮观。这种状况,正是孙犁“文艺周刊”应该是苗圃的例证,因为苗圃固然不拒绝名人作品,但更多是希望贴近青年和业余作者,希望在从中能够发现好的“苗子”。因此,青年作家是孙犁在很早就确定的“文艺周刊”关注的作家群体。再准舟在中学时就受到孙犁作品的感染,“他的诗一样的长篇小说《风云初记》,是那样深深地吸引着我,他主编的‘文艺周刊’,我也是每期必读,那上面经常发表孙犁同志的作品和他指导青年写作的文章”如果不是1956年孙犁生病及其后的变故,这个青年苗圃会发展成什么样子,是难以估量的。新时期以来,孙犁对青年写作的关心一以贯之。1981年4月30日“文艺周刊”发表了贾平凹的《一棵小桃树》,孙犁立即写了一篇评论《读一篇散文》,赞扬其“短小”“不摆架子”。孙犁在评论铁凝的《哦,香雪》的时候,直接说“这是一首纯净的诗,即是清泉”。这对贾平凹、铁凝的鼓励是不言而喻的。

就此来看,孙犁和“文艺周刊”影响了至少两代年轻作家,他们都是因为对孙犁写作风格的喜爱,模仿而走上创作道路的,这是文学史事实。因此,谈“荷花淀派”的时候,应该以此事实为依据。我虽然曾撰文支持“荷花淀派”是存在的这个观点,但更多是从美学原则的传承角度说的,因此,如果有人从语境、概念理解和孙犁个性等方面否认,我也不反驳。不过,我认为,应该跳出“荷花淀派有无”的思维,或者说,从影响的角度看,即便不存在“荷花淀派”,但其中的脉络却是很清晰的,如果拿到当代文学史中,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独特现象——这个“问题”的价值是远大于“概念”辨析的。

“寻根文学”的潮流中,“津味”小说作家群登场,冯骥才的《神鞭》《三寸金莲》,林希的《触礁四爷》(相士无非子)、张仲的《龙嘴大铜壶》等以津腔发声,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坛竖起“津派”旗帜,呼应了地域文化的建构。同时,也形成了独属于天津的“写什么”(题材)、“怎么写”(语言)的“场域”。于是,围绕“津味”做文章就成了新的课题。由此开始,“文艺周刊”介入和引领“津味”写作,联手奉献出了对天津这座城市和文化的理解。

“文艺周刊”1986年5月8日发表了张仲的《古董张》,6月26日,又发表了冯骥才的评论《当前的文化小说——从(古董张)说开去》,开启了关注“津味”的序幕。冯骥才在文章中称赞《古董张》是“地道的”“津味”小说,因为作品“想有声有色、有血有肉、有神有态端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状态”。此后,“文艺周刊”开始长期关注津味小说,每隔一段时间就做一次推动。1994—1995年,“文艺周刊”推出了“津味小说联展”2002—2003年,组织了“津味小说精英”,2005—2006年,将栏目冠名为了“津味小说选刊”,2014—2015年则是“津味小说甲午年赛”。也许可以说,经过一波又一波的讨论,到底什么是“津味”,越来越复杂了,而这恰是一种好的状态,本身“津味”就应该是历史和当下共存的,能够感受到,却人言人殊的、多味杂陈的。因此,“津味”写作与其说是一种展现,不如说是一种寻找——可能每个人都有心目中的“津味”。

“文艺周刊”在多年对“津味”的反复书写和研讨中,成为一处具有“养料”的“苗圃”——因为参与“津味”写作的既有成名大家,又有初露头角的新秀,他们虽对“津味”有着不同的理解,但并不妨碍齐聚“文艺周刊”,表达对天津和天津文化的热爱,这大概不是苗圃所能做到的事了,也因此,“文艺周刊”成为对一个城市的作家、文化源源不断提供滋养的“源头”。孙犁对“文艺周刊”的希望和要求,就此来看,是“超额”完成了。

“文艺周刊”在天津文学发展的过程中,是耀耀的存在,作为“平台”和“抓手”,它始终参与着“文学天津”的建构。孙犁是把“文艺周刊”当作自己的苗圃的,他在漫长的编辑、写作生涯中,精心打理呵护,使“文艺周刊”有了浓厚的孙犁“气质”。至于这种“气质”是什么,可能还是孙犁描述得更形象:“作为内容,这片园地里,种植的仍是五谷杂粮,瓜果蔬菜;作为形式,这个刊物,仍然是披蓑戴笠,荆钗布裙……”难得的是孙犁入城三十多年,仍保持乡土本色;更难能可贵的是,这种偏于“农民”和“朴素”的美学,竟然能够在大都市天津得到认可并延续,这个有趣的现象,可能是“现代中国”“文学天津”的隐喻了。

第三〇〇三期
纪念专版

刘卫东

「文艺周刊」：天津文学的一处苗圃

刘卫东

刘卫东

刘卫东

刘卫东

编后
75载风雨兼程,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迎来了3000期纪念。四分之三个世纪的赓续传承,前辈编辑们的辛勤耕耘,让“文艺周刊”桃李满园,百花齐放。1983年5月5日“文艺周刊”出刊1000期,孙犁先生在《我和(文艺周刊)》一文中,强调要重视培养青年作者、鼓励新人新作。“文艺周刊”一直传承和践行着这一办刊方针。2002年8月8日,“文艺周刊”出刊达到2000期,纪念版面上名家云集,欢欣祝福溢于纸上。22年过去,我们以四期专版纪念“文艺周刊”3000期,感恩无数新老朋友对“文艺周刊”的惓惓深情和殷殷勉励。
行程万里,初心不变,愿未来“文艺周刊”继续与作者、读者携手前行,再创佳绩。

文艺周刊